

一战期间中国收容及遣回德奥俘虏始末

袁灿兴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一战初, 在中国尚未对德奥宣战时, 就有一定数量的德奥俘虏被中国收容。至中国对德奥宣战后, 驻京德奥使馆卫队及驻天津德奥军队均被加以收容。对所收容之俘虏, 中国制定了系列俘虏管理条例, 并在伙食、医疗、薪俸等各方面给以极大优待。一战结束后, 至中国正式与德国达成和议, 中国经海路将在华之德奥俘虏予以遣返。对一战后一些新独立国家的俘虏, 中国也一一予以遣返。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奥战俘之收容, 既是海牙和会关于战俘待遇之陆战规例第一次在中国实践, 也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近代史; 德奥俘虏; 海牙公约; 外交事务处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3-0110-06

一、收容德奥俘虏之缘起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爆发时, 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正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中, 在国际舞台上亦无足轻重。而近代中国在历次战争中所经历的割地赔款之痛, 使得当时之中国不得不小心翼翼, 选择局外中立, 避免战火蔓延至中国。一战爆发后, 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于8月3日要求列强在华之租借地与租界保持中立, 8月6日, 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 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 决意严守中立”。^[1]

一战的爆发为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提供了契机, 8月15日, 日本向德国发出通牒, 要求德国无条件、无代价地“将胶州湾移交日本”, 并限8天答复。德国对此置之不理, 日本随即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对德国宣战。11月, 日本攻占青岛, 强占胶州湾。德国在山东之部队约四千五百人成为日本俘虏, 并被押解至日本收容。

在山东之德军除被日本俘虏外, 也有少数德国水兵选择向此时尚为中立国的中国投降。1914年11月, 被日本海军追击的德国海军鱼雷艇S60号, “初欲逃亡上海, 嗣因负伤甚重, 日舰追之又急。恐为所捕。”便在山东日照县海域将鱼雷艇炸沉, 然后登岸向当地中国驻军投降, “官兵六十一人由石臼所下岸, 愿弃船往上海语。”随后此六十一人, 被送至南京安置。当时

的江苏政界要员对这批德国俘虏颇为重视, “前往浦口车站, 接受是项德军官兵六十一人, 即安置于南洋劝业会场之内, 并派军警在彼加以保护, 不准德军官兵相离住所寸步, 避免酿祸。”^[2]

在中国于8月6日颁布的《局外中立条规》中, 就收容俘虏做了如下规定: “各交战国之军舰及附属各舰, 在中国领海内不应停泊之口岸, 经中国官员知照而不开行者, 中国得令其卸去武装, 所有船员一并扣留至战事完毕时为止。所扣留之军队、船员, 如乏衣食, 中国政府当量力供给, 俟战事毕, 应由各交战本国如数偿还。”^[1](322-324)]故而中国根据该条规收容德国俘虏, 日本对此亦无异议。^[3]

除南京收容的德国俘虏外, 在东北各地, 中国亦收容了相当数量的德奥逃俘。一战期间, 俄国将其在东线战场所俘获的德奥俘虏, 押送至远东地区加以看押。俄国深陷战争泥潭, 国内物质匮乏、粮食紧缺, 自然无力满足俘虏正常生活之需, 故而远东地区的德奥俘虏处境颇为艰难。如在俄国进行俘虏救济的瑞典红十字会云: “俘虏因饥饿而死者已居大半, 其余亦均虚弱无力, 如不急行设法周济, 亦不免毙与饥饿。”^[4](5014)]为了生存, 远东地区的德奥俘虏不得不选择出逃, 而与俄国接壤的中国, 自然是俘虏出逃的主要方向。

对于从俄国境内逃入中国的德奥俘虏, 中国方面一概予以收容, 并以与中立有碍为由, 对俄国的追索要求加以拒绝。如1915年(民国四年)2月13日, 有数

名俘虏逃入中国境内。俄国阿穆尔省总督进行交涉，称有俘虏数名逃入华境，中国交界官不但不为拘留，反有助其逃走等情形，要求中国将逃俘归还。对此交涉，中国外交部回复称：“因查德俘逃入中立国界内，本无拘留之义务。惟若为交战国在中立地内重行捕去，实于中立有碍。”当时的北京政府方面还饬令地方官员，若俄国再来讨要逃俘，应“坚守中立义务，严词拒交。”^[5]有意思的是，民国5年4月2日，一名在黑龙江漠河被收容的德国逃俘，“突发临时神经病”，而漠河当地对德国俘虏又疏于防范，以至该俘虏越过中俄边境，再次被俄拘禁。事后，“嗣经知事等秘密设法，积极运动，不得已冒险进取，仍将该俘虏收回。”^[6]

此后陆续有更多数量的德奥俘虏，从边境逃入中国。最初中国境内尚无俘虏收容所，所逃入的俘虏，有租住民居的，有被关押在工厂的，有被警察厅收留的，纷乱不一，管理混乱。德奥逃俘的混乱情形，既不利于社会治安，也会给协约国留下口舌，故而东北地方当局决定，“拟仿照江苏收容日照德舰水兵办法”，^[7]建立俘虏收容所。1916年至1917年间，在东北之吉林、龙江、海伦三地，先后建立俘虏收容所收容德奥逃俘。

中国对德奥逃俘一概予以收容，并拒绝俄国的追索要求，这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相关。一战爆发后，在华获取巨大利益的日本，自然不愿中国对德奥宣战，以免中国在战后有资格参加国际和会，获得维护国家权益的机会，故而日本希望中国保持中立。德国政府则对北京政府的表现大为不满，“因守卑屈愚昧有名无实之局部中立，迭招德国不严守中立之抗议而不能答复。”^{[8](623)}而同为协议国的英俄则拉拢中国，1915年英国公使与俄国公使拜访梁士诒，表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俄使还表示：“如因中立生外交问题，英俄均可担任。”^{[1](392-393)}在此背景下，对德奥逃俘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指示东北地方政府对德奥逃俘一概加以收容，并拒绝俄国之追索，以免落下口舌，造成外交争端，影响中立地位。

到了1917年4月，随着美国对德宣战，许多中立国纷纷倒向协约国阵营，欧洲战局已趋明朗，德奥已呈败像，此时加入协约国阵营对中国更为有益，且协约国方面也抛出了优惠条件：“协约国方面愿意考虑中国增收关税展缓赔款的要求，这既可调剂财用，又以维护主权，实为中国之利。”这样，在1917年(民国6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对德、奥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行列，并宣告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两国所订条约及与中德、中奥有关的其他国际条款、协议，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

一律废止。

随后中国政府下令将驻北京使馆区之德奥使馆卫队及依照《辛丑条约》驻扎在天津的德奥军队解除武装后加以收容。为收容北京、天津二地的德奥两国俘虏，中国政府“乃于近畿一带分设收容所两处，一设于海甸之朗润园，以拘禁德使馆之卫队，四月三日由驻和使署武官送交德使馆卫兵共三十名入所。一设于西苑，以拘禁奥俘。遂于九月十四日由和使交收奥俘官长、士兵等共一百三十八员名入所。”^{[9](401-402)}至中国对德奥宣战后，中国境内共建有八处俘虏收容所，分别是在北京之海甸收容所、西苑收容所，在南京俘虏收容所、吉林俘虏收容所、海伦俘虏收容所、黑龙江江俘虏收容所、新疆俘虏收容所，至1918年(民国7年)12月底，共收容德奥俘虏1033名。^{[10](319-320)}

二、德奥俘虏之管理与待遇

在对德奥宣战前中国曾成立外交筹备处，处理涉及俘虏的军事外交事务。到对德奥正式宣战后，外交筹备处的名义不再适用，于是将之改组为外交事务处。外交事务处直属于陆军部，主要负责“收容德奥二国居留我国境内之陆海军人为俘虏，于中央及苏吉黑各省、分设收容所以监视之，组织俘虏审检委员会，并编订关于管理俘虏之各项规则条例颁发各收容所以资遵守”。^{[10](319)}外交事务处成立后，即组织专人参考海牙和会所订之陆战规例等涉及俘虏的国际条约，制定俘虏处罚条例及管理条例，以处理在华德奥俘虏各项事务。

在海牙和会所订陆战规例第八条中规定，俘虏应服从从捕获国之现行法令，如有不愿服从行为，则得加以必要之严重处分。^{11}依此规定，外交事务处制定了俘虏处罚条例，就俘虏被收容期间的暴力反抗行为与出逃行为做了严厉规定。处罚条例规定聚众暴力反抗为首者最高刑罚可处死刑，有出逃行为者处以重禁闭或者轻禁闭之刑罚。处罚条例亦规定，凡俘虏之处罚均由军事司法机关加以审判。^{[12](44)}整个一战期间，由于中国方面之宽待，德奥俘虏未曾发生暴力反抗事件，但仍有耐不住寂寞的俘虏出逃。而追回这些出逃的俘虏，常成为一出轻松的喜剧，对被追回的俘虏，中国也未施以严格惩戒，大体上予以拘禁一段时间了事。

处罚条例之外，外交事务处亦编订了详细的俘虏管理条例，涉及到俘虏起居、俘虏会客、俘虏散步、俘虏信件、俘虏汇兑、伤病住院等各个方面。这些管

管理条例在执行上并不算严格,德奥俘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如俘虏管理条例中,就俘虏晚间外出归来时间有规定,但俘虏经常不遵守规定,也无人加以管理。一战后有在吉林收容所的俘虏回忆,曾前往尚留在吉林之德商家中饮酒作乐,“至夜深始回所,其时德兵数人,亦自外而归,闻其言辞,系由戏院归来也。”^[13]

在俘虏生活上,中国遵照海牙陆战规例,在伙食、医疗、薪俸等方面给予俘虏应有之待遇。德奥俘虏在华生活待遇可谓是相当优厚,一战结束后,有德国俘虏在《申报》上发表回忆,述道:“尝见多数德人,将其当日被俘敌国不能满意之情形,登于报端,独中国则不然。待遇俘虏较他国为优。”

德奥俘虏在华收容期间,中国予其每月伙食标准为士兵每人20元,吉林、海伦、龙江等地收容所,因为当地食物价格较高,故而标准也提升为27元每人。^{[10](327)}1919年北京中等生活水准的四口之家,一月伙食费,含米面、肉、蔬菜、油、调料等在内,所需不过为36元。^[14]这还是在物价连续两年上涨之后的生活水准,一月20元的伙食标准,在整个一战期间都是相当丰盛了。

各处收容所俘虏伙食不但丰盛,且享有酒水饮料供应。一名德国俘虏在战后回忆了其在吉林收容所一天的伙食:“余等三军官中,有一人早起,见食堂内有匈牙利士兵,清晨即向厨役索食烤牛肉,不觉为之捧腹。该所可以随意点唤食物,而厨役所备食单,亦极详备。及至吾辈早餐时,厨役送来之鱼肉鸡蛋面包咖啡等物,亦洁净而完备,牛乳与糖常置于几上,随意畅饮。午餐所备则较丰之,除肉菜多样及咖啡水果外,尚有日本仿造之德国啤酒各一大瓶。下午又给咖啡点心一次,迨至晚餐时,所有肉菜水果咖啡啤酒等物,亦见周备,惟酒钱须吾辈自给。”^[15]

在华之德奥俘虏,均享有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北京的德奥俘虏,“病伤及治疗俘虏遇有伤病,均由各收容所医官调治,其有病较重者则送入医院。最初会交由德国医院诊治。迄本部陆军医院成立后,一律送入陆军医院诊治。”^{[10](322)}据关押在西苑收容所的奥地利战俘回忆,由于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人患过伤寒、猩红热、疟疾、痢疾、腹泻、霍乱、肺病和其他小毛病。”^{[16](198)}尽管如此,在16个月的收容期内,西苑收容所内之163名奥匈战俘中,仅有一人死亡。^{[10](338)}

在北京之外各收容所的俘虏,也均享受到良好的医疗待遇。在南京的德国俘虏,凡有疾病者,皆送往当时江苏最好的医院金陵医院予以救护。在东北的德奥逃俘,由于从俄国出逃期间防寒不足,普遍存在冻

伤的情况。对此,东北地方当局予以悉心照料,如曾有德奥俘虏五名从俄国逃至中国延边地区,初到时冻疮严重,“由延吉医院医官用去腐生新法逐日敷洗,故溃烂处未致蔓延。”^{[17](460)}对个别情形严重者,或请德国医生到东北进行救治,或转送至北京治疗。

此外,根据海牙陆战规例第十七条规定:俘虏将校于其本国规则中若载明在俘虏地位需给薪俸者,得向监守俘虏国领受其应得之薪俸,但此款应由俘虏之本国偿还。^{[11](14)}参考此规定,中国方面决定给在华之德奥俘虏发放一定薪俸。在执行薪俸发放时,陆军部提出疑问:“吉黑两省多系逃俘,似不能与江苏、北京等处由我国收容者相提并论。”“若照薪表办理,需款既为数甚巨,所偿亦未预知,应否详加审查。”就此外交部回复:“查该薪俸表,既由中央拟定,分行各处,自应一律遵照办理。”^[18]

在华之德奥俘虏,其军官依照军衔和军种不同,分别领取一定数量的薪俸。薪俸制定的标准,主要参考中国陆海军当时的薪俸标准。相比较而言,海军所领取的薪俸高于陆军。军官中最高者,海军上校每月可以领取420元、陆军上校可以领取284元,最低级别的军官,准尉每月也可领到22元薪俸。士兵中,班长每月可以领取4元,士兵则领取2元。^[19]士兵薪俸虽低,但伙食免费,而将官则需要从薪俸中支出伙食开始。

总体而言,在华之德奥战俘享受的可谓是超国民待遇。在江苏之德国俘虏,自1914年进入南京收容所以后,每年至夏季酷暑难耐时,俘虏竟然北上北戴河避暑。^[20]比之于在华德奥俘虏的惬意生活,在日本的德国俘虏之生活,却是另番天地。“据德俘言,在日本之俘虏生活,殊为可怖,俘虏营恍若马厩,不备寐铺。逐日食物,早餐为茶与面包,午餐仅有蔬菜,即寻常豆类。晚餐有山芋两枚,肉一块,约一寸见方。寻常俘虏须工作,每日得工资四分。有不听命者,则武装卫兵殴之,或以棒击之。”^[21]

三、德奥俘虏之遣返及收容费用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的有巴黎凡尔赛宫会议的有英、法、美、日、意、中等二十七国。中国派出由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的王正廷等组成代表团参与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向列强提出取消在华特权、废除中

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等要求。但会议被英、美、法、日等强国所操纵，列强无视中国之要求，将德国在华之权益转让于日本。为抗议此强权行为，中国代表团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签署对德和约，并称：“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陈，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2〕〔53〕}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未曾签署对德和约，但中国外交部已开始做遣回德奥俘虏的准备。“查我国对德和约虽因山东问题未经签字，然中德战争状态迟早必解除。所有现在暨将来对于敌国侨民俘虏如何办法，似应由各主管机关审议，以资随时因应。”^{〔23〕}

至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结束对德国之战争状态，并决定将所有德奥在华俘虏一概遣回。就在准备遣返德奥战俘时，中国外交部突然听到路透社的消息，说协约国将视德国履行和约与否，决定是否遣回俘虏。外交部认为，中国若单独遣送回俘虏，“显与协约国独异，此中是否有嫌疑，暨将来是否发生他项问题，事关国交，故而应酌核再定。”^{〔24〕}

就在中国准备暂缓遣返德国俘虏时，荷兰驻华使臣却告知，日本已由海路遣回第一批德国俘虏，随后还有两批将德国俘虏将从海路遣回。荷兰使臣请中国尽早拟定办法，将在华之德奥俘虏集中送到上海，以便搭乘第二、第三批日本遣俘船只回国。这样，中国放弃了原先使用荷兰船只遣回俘虏的计划，决定利用日本船只之空位，将德奥俘虏悉数遣送归国。^{〔25〕}

1920年1月22日，中国陆军部发函，“关于遣送德奥俘虏一案，经与和馆磋商就绪，并电飭吉林海伦龙江各所，将应遣德俘暨海甸西苑收容之德奥俘虏，一律送宁，连同南京收容之德俘，一并遣赴沪。”^{〔26〕}日本运送第二批德国俘虏的船只“赫特森丸”，于1月28日从日本开出，31日抵沪。2月3日，在荷兰武官的护送下，集中在上海的在华德奥俘虏登船回国。

德奥俘虏遣送之外，中国还需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变更国籍后的俘虏。在东北收容的奥匈帝国俘虏中，有相当部分系奥匈帝国所统治下的民族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一战结束前后，这些民族纷纷宣布国家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承认，此时俘虏国籍也相应发生变更。“欧洲和议开始以来，各族人民多请求建设独立国家，因之在中国被收容之俘虏遂发生国籍变更问题。”

对于塞尔维亚、捷克、波兰这些新独立国家仍被收容的俘虏，驻华各国使馆纷纷请中国予以释放。中国一方面认为，“对于此项人民，原无收容之理”；但

另一方面，这些俘虏的国籍来源仅在于其自述，而无法加以确实证明。若加以释放，则这些国籍无法确证的俘虏，可能无处可归，造成不必要之外交麻烦。故而对于各使馆的释放请求，中国拟定办法三端：“一、代请释放俘虏之国籍，虽由该俘自行声述，仍由代请使馆加以证明，以免被混冒。二、代请释放之俘虏，应由代请使馆声明，被放后即离华境。三、如有逗留境内，应由代请使馆自责，限期令其出境。”^{〔27〕}

这些变更国籍的俘虏，在德奥俘虏之前就已开始遣返。在遣返过程中，有一部分变更国籍的俘虏向中国提出申请，要求在中国居住。就此问题，陆军部发函咨询外交部：“现值遣回俘虏之际，东省变籍俘虏，多有请求留居中国者。我国对捷克斯拉夫及右克斯拉夫籍俘虏，是否准其留居中国，及有无限制之处？”^{〔28〕}对这些变更国籍的俘虏留华居住的请求，中国外交部悉数加以拒绝，外务部回复称：“本部对新变更国籍各种俘虏，曾拟定办法三端，注重令其离去中国境内，此外并未规定何项办法。”^{〔29〕}

在结束俘虏遣送之后，到民国九年九月，德国派代表赴京磋商中德间一切问题，磋商也涉及到中国收容俘虏之费用。依凡尔赛和约第224条规定，交战双方均放弃索要收容俘虏之费用。但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形不同，中国未曾与德奥直接交战，亦未有俘虏为德奥所收容，故而放弃对德奥之索要收容俘虏费用，不合于情理。“该费用按照和约第224条，虽不能向德国索偿。而我国情形与各国不同，仍应提出以为他项利益之交换。”

中国的考虑乃是，在对德奥绝交后，中国曾停付对德奥两国之庚子赔款。这两笔赔款的数目，远在德奥两国应偿付之收容俘虏费用之上，“核我国与德奥彼此各账，欠敌之数倍于我欠敌。”设若德奥两国不偿付收容德奥俘虏之费用，则中国可在庚子赔款上提出有利要求。经陆军部对收容费用进行核算，“收容俘虏费用截止七年，共银一百零五万二千五百七十四元等。”^{〔30〕}这笔费用包括了在华德奥俘虏，从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间的一切费用。尽管收容的乃是德奥两国之俘虏，但中国却只向德国提出偿付要求。对所欠中国之收容俘虏费用，德国在华代表于1920年5月20日表示：“准备将中国各处收容德国军人之费，偿还中国政府。”^{〔31〕〔2〕}随后几年，德国将这笔款项分期加以偿还。

四、结语

一战爆发后，考虑到欧洲交战各国在华均有驻军

与租借地,为避免战火蔓延至中国,当时之北京政府决定在列强间保持中立。外交上的中立选择,使得中国不得不谨慎处置逃往中国之德奥俘虏,以免妨碍中国之中立地位。至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德奥在华驻军与使馆卫队被中国加以收容,关于俘虏之管理与处罚条例亦被正式制定,由此开启了中国根据国际法收容敌国俘虏的历史。在自然灾害频发、国内财力有限、国家局势变动不安的当时,中国所给予德奥俘虏之诸般待遇,以中国当时之条件而论堪为“超国民待遇”。这反映了当时之北京政府,希望通过予战俘以良好待遇,表明自己也可独立承担国际义务,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进而能对中国的国际局势有所改善的愿望。

中国在一战期间善待俘虏,既得到了协约国的赞同,也为德奥两国所认可。因中国善待德奥俘虏,在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德奥两国对在德奥之中国侨民与学生给予极大照顾。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德奥两国也放弃了对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的要求;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交涉中,也有了其道义之基础。一战中对德奥俘虏之收容,也是海牙和会中涉及战俘问题之陆战规例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在俘虏的收容管理过程中,北京政府通过实践摸索,对国际法体系有了更多了解,为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尽管收容德奥俘虏包含了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诸多考虑,但在这过程中所展示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值得加以肯定并加以记述的。

注释:

1899 年经俄国沙皇发起,荷兰政府邀请,26 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海牙和会(Hague Peace Conference),会上形成条约三个与声明文件一个,其中涉及俘虏待遇的条约为陆军战地规例。清政府参与了海牙和会,并于 1907 年批准了海牙陆军战地规例。

在庚子赔款中,德奥两国合计所占比例为 20.91%,德国为 9 000 万两,奥匈帝国为 400 万两。参见王树槐. 庚子赔款.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 31 辑. 台北: 精华印书股份有限公司. 1974: 27.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 第三辑(一)[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2] 安置德国逃兵[N]. 申报, 1914-11-5(7).
- [3] 中日关于 S60 舰之交涉[N]. 申报, 1914-11-6(3).
- [4] 民国孤本外交档案: 第 16 册[Z].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 [5] 德俘虏逃入吉省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104-01-006.
- [6] 俘虏事由[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105-02-002.
- [7] 吉林收容德奥俘虏办法[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03-36-104-03-037.
- [8] 孙中山全集: 第四卷[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外交: 第三辑[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10] 陆军行政纪要[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1.
- [11] 两次批准保和会条约[Z]. 杭州: 浙江办理中立事务所重印, 1914.
- [12] 外交文牍. 参战案(第一册)[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 [13] 德人述中国待遇俘虏情形[N]. 申报, 1921-04-19(6).
- [14] 北京社会生活费概略[N]. 申报, 1919-11-24(6).
- [15] 德人述中国待遇俘虏情形[N]. 申报, 1921-04-19(6).
- [16] [奥]格尔德·卡明斯基等著, 奥中友谊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 [17] 北洋军阀史料. 徐世昌(卷七)[Z].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 [18] 德奥俘虏薪俸表勿庸分别逃俘应一律办理[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96-06-012.
- [19] 函送拟订德奥俘虏军官薪俸表[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96-06-010.
- [20] 南京俘虏避暑[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97-02-013.
- [21] 美报纪日本遣送德俘消息[N]. 申报, 1920-02-04(10).
- [22]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1919-1931)[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23] 待遇敌侨民俘虏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3-03-011.
- [24] 遣回德奥俘虏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3-03-054.
- [25] 遣回德奥俘虏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3-03-059.
- [26] 遣送德奥俘虏事请派员赴宁接洽[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4-02-019.
- [27] 代请释放俘虏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3-03-029.
- [28] 东省变籍俘虏请新变籍俘虏请留中国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4-02-032.
- [29] 新变籍俘虏请留中国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4-02-032.
- [30] 收容俘虏费用事[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部档, 档案号: 03-36-084-03-029.
- [31] 外交文牍[Z]. 中德协约及附件(第三册)[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About the German and Austria POW in China in the World War 1

YUAN Canxing

(Department of Societ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1, before China declared war to German and Austria, some German and Austria POW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After China declared war to German and Austria, more German and Austria soliders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series of control regulations were made for those POW too. POW of German and Austria received well treatment from meals to medical care in China. After the war, China made peace agreement with German and Austria, all the POW in China were repatriated to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German and Austria POW in China were Hague peace conference's first practicing in China, it also illuminated humanitarian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World War I; Chinese Modern History; German and Austria POW; Hague Convention; POW Intelligence Bureau

[编辑：胡兴华]

(上接第 82 页)

Abstract: As to the problem whether transfer of business contract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 assembly, there are two views: negation theory and affirmation theory. To prote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the author agrees with affirmation theory, and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discuss whether should transfer of business go through the resolution under shareholders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author argues, include companies that go out of business, companies that is beyond debt, companies in liquidation and parent-subsidiary companies. It is reasonable to cognize the business transfer contact influenced by the resolution flaws of shareholders general assembly as to revocable contract, and it's advisable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 With respect to right to countermand in transfer of business contract, the author disserts in detail the main body of exertion, methods, period, limitations and exclusions.

Key Words: business transfer; revocable contract; right to countermand; effectiveness

[编辑：苏慧]